

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

[日]六角恒广 著 王顺洪 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2-614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编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

ISBN 7-301-06034-3

I.日… II.①六… ②王… III.汉语-教师-列传-日本-近代
IV.K833.13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7925号

漢語師家伝
東方書店 1999.5

书 名: 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

著作责任者: [日]六角恒广 著 王顺洪 编译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034-3/G·079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印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96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5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0.00元

著 者 序

拙著《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被北京大学王顺洪先生译成汉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人感到十分高兴。

本书选择从日本近代汉语教学起步时期，到1945年日本战败七十五年间的七位汉语教师，分别记述了他们从事汉语学习和汉语教育的生涯。之所以从该期间众多的汉语教师中选择了这七位教师，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名人物，一生致力于汉语教育。他们不仅为某个时期的汉语教育做出了贡献，而且，所编的汉语教科书一直为后人所用，在日本的汉语教学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七位汉语教师，是在不同年代走上汉语学习道路的。然而，他们选择学习汉语以及后来从事汉语教学，均是因为对中国和汉语抱有亲近感，尊敬和憧憬中国文化。因而，即使在得不到什么经济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执著地热心于汉语教育。

那一历史阶段，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一步步走向侵略，日本国民均受到了政府政策的影响，汉语教师自然也未能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并使人感到惭愧，此乃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消极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的汉语教育终于在反省过去的基础上，以日中友好为宗旨发展起来了。

王顺洪先生以前曾翻译过我的《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日本中国语有关书书目》三本书，加上这本《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他已翻译了我的四部著作。这些著作在我对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是主要的核心性的研究成果。

王顺洪先生将它们一一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实际上是将日本近代汉语教育史,以及对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全面地介绍到了中国。可以说,王顺洪先生在这方面是做出了国际性的贡献。

本人的数部著作被王顺洪先生译成汉语,使我五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越过海洋传到了中国,这件事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国际意义,而且也体现了日中两国“一衣带水”的紧密关系。就我个人来说,这些著作就像是我的化身,让我永居于自己无比憧憬的中国。鉴于此,我对王顺洪先生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更多了一层纪念意义,为此,我也要向北京大学出版社表示真诚的谢意。

六角恒广

2002年9月29日

于日本千叶县住所

目 录

著者序	1
编译者序: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师.....	1
颖川重宽:从唐通事到汉语教师.....	17
广部精:提倡日中友好与《亚细亚言语集》.....	29
中田敬义:汉语道路及外交工作生涯.....	45
御幡雅文:习熟北京官话、闽南话、上海话的汉语教师.....	69
宫岛大八:师从中国鸿儒与创办善邻书院	101
井上翠:从日语教师到编纂汉语辞典名家	129
秩父固太郎:从中学教习到汉语教育专家	159

六角恒广,1919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日本汉语教育史专家。已出版著作有《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日本中国语教育史论考》、《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日本中国语学习余闻》、《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日本中国语有关书书目》、《日本中国语教本集成》等。

编者序：

日本明治时期的汉语教师

在源远流长的日本汉语教育历史上,明治时期占有特殊位置。这个时期,日本汉语教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内容从古典文言转变到以白话为中心,口语从南京话转变到北京官话;价值取向从文化意义转变到主要追求实用,汉语从向中国学习的媒介变成了向中国扩张的工具。另外,明治以前基本没有专门的汉语学校、专职的汉语教师和公开出版的汉语教科书,幕府时代虽产生了“唐话”教育,但仅是唐通事们的“家学”;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出现了专门的汉语学校和专职的汉语教师,正式出版汉语教科书,汉语教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这些转变,标志着明治时期日本的汉语教育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考察日本汉语教育历史,除了要对各个时期汉语教学的机构、教材、宗旨、背景等进行研究外,关于教师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育界的一些著名人物,既是新时期汉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汉语教学讲坛上的普通教师,他们以汉语为资本,以汉语教育为事业,对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日本近代史是一部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历史。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重视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然而,却逐步把中日关系推入了不正常状态。汉语教育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明治时期汉语教育界的每一个代表人物,可以说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1999年5月,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日本汉语教育史专家、著

名学者六角恒广的《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原书名为《汉语师家传》)一书,此书选择了日本明治以后七位颇有代表性的汉语教师,详细记述了他们从事汉语学习和汉语教育的人生旅程,七个人物就像一面面“镜子”,清楚地映照出了日本明治以及后来一段时期汉语教育的真实景象。这部通过人物传记揭示历史的书,对于人们了解那一段日本汉语教育及中日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七位著名汉语教师的生平

书中七位著名汉语教师是:颖川重宽(1831—1891)、广部精(1854—1909)、中田敬义(1858—1943)、御幡雅文(1859—1912)、宫岛大八(1867—1943)、井上翠(1875—1957)、秩父固太郎(1876—1948)。把这七个人物生卒和从事汉语学习、教学活动的时间按年代顺序排列起来,恰好构成了明治时期以及后来一段时间日本汉语教师和汉语教育事业不断延续的人物画廊。

颖川重宽,祖籍中国福建漳州,1831年生于日本长崎,世代为长崎唐通事,他本人乃第九代。颖川重宽15岁做“见习通事”,后来逐阶提升,20岁为“小通事末席”,24岁为“小通事并”,26岁为“小通事助”。1857年,颖川重宽被幕府任命为江户学问所“译司”,四年任期结束后回到长崎,与其他唐通事共同建立了“译家学校”,教子弟们学习“唐话”和英语。明治维新以后,1870年6月,经“大译官”郑永宁推荐,颖川重宽被调到外务省,7月,辅助郑永宁做日本使团译官,到中国参加“中日修好条约”预备谈判,回国后与郑永宁一起筹建了外务省汉语学所,从事并主持汉语教学工作。1871年5月,颖川重宽第二次做使团译官到中国缔结“中日修好条约”。1873年,第三次做译官到中国出席“中日修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1873年,汉语学所改由文部省管辖,更名为外国语学校,后与其他外语教学机构合并,成立了东京外国语学校,虽几

经辗转变化,但颖川重宽汉语教学负责人的地位一直未变。1886年,合并到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及其汉语学科撤销,颖川重宽退职,1889年回长崎养老,1901年病逝。

广部精,1854年生于日本上总国君津郡(现千叶县木更津市),5岁始进私塾学汉字和汉学,读《三字经》、“四书五经”。广部精自幼受父亲影响,主张“日本开国”、“日中亲和”、“挽救亚洲”。明治维新以后,1871年,广部精到东京求学,1875年2月始跟中国人教师周幼梅学汉语。1876年12月,广部精创设汉语学舍“日清社”,传授汉语和汉学,还办了杂志《日清新志》、《寰海新报》。1877年8月,日清社倒闭,广部精转到“同人社”教汉学,同时,跟中国人教师薛乃良学习北京官话。后来,他周围具有共同“亚洲观”的学生组织了“汉语会”,请他教授汉语,同时他还被请到陆军省会计局和“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教汉语和汉文。1880年11月,广部精恢复了“日清社”更名为“日清馆”,1884年10月,“日清馆”关闭。1884年2月,广部精被正式聘到陆军省会计局做监察工作。从此告别汉语教学。1890年,广部精到陆军财会学校任教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到中国辽东半岛做日军后勤工作,归国后退役。后来,广部精曾先后受聘于神社、银行、制铁公司。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广部精再次应征到大连做日本军队后勤工作,1906年复员,1909年8月病逝于东京。

中田敬义,1858年6月生于日本加贺藩,6岁上学,8岁读“四书五经”。1870年,被加贺藩选派到外务省汉语学所学习汉语。1876—1881年,被外务省选派到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学习北京官话。在北京期间,中田敬义将日文版《通俗伊苏普物语》(《伊索寓言》)译成汉语,并曾在中日关于琉球问题的谈判中担任翻译。从中国回日本后,在外务省公信局做公文翻译,兼“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汉语教师。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件”,中田敬义被派到朝鲜出差,参加中日谈判。1883年,日本外务省举行赴中国留学生

选拔考试,中田敬义是倡议者和考试委员。1883年,中田敬义被任命为外务大臣秘书,1884—1890年到日本驻英国公使馆工作,与中国驻英公使馆官员有私交。1895年,在中日“马关条约”谈判中,中田敬义为日方翻译。后来,中田敬义又当过数位外务大臣的秘书以及外务省政务局长。1898年,中田敬义被辞离开外务省,1900年到古河合名会社任职,1905年曾为该公司到上海、南京、汉口、北京等地考察。1943年10月,中田敬义于东京去世。

御幡雅文,1859年生于日本长崎,6岁进寺子屋学习汉字,8岁入汉学塾读“四书五经”。1873年10月,离开长崎到东京找郑永宁求学,先跟郑的弟弟学汉语,1876年2月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学习。1879年,作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选派的留学生到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学习北京官话,1881年底回日本。回国后,被派到熊本做军队汉语教官,同时在偕行社、济济黄、商业学校教汉语。1890年,御幡雅文被荒尾精请到“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教北京官话及上海话。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该校全体学生应征做翻译,御幡雅文回到日本,被任命为日军某司令部一等翻译官,到了中国辽东半岛。1895年回国后,被派到日本刚占领的台湾做总督府翻译,在台湾学会了闽南语。1898年9月,御幡雅文被三井物产公司聘到上海职员培训所“三井书院”教授北京官话、上海话及中国经济、商业、习俗等课程,兼东亚同文书院汉语教师。1910年10月,御幡雅文因病回国,1912年3月于长崎去世。

宫岛大八,1867年生于日本米泽藩,父亲宫岛诚一郎是藩士,明治维新后被起用,举家迁到了东京。1871年,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877年,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等抵东京。喜欢汉诗文的宫岛诚一郎与中国公使馆人员交往密切,宫岛大八深受影响,13岁始跟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之弟黄遵楷学汉语,后转入“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学习。1882年,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关闭,他转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学科。1887年,宫岛大八从父亲处接触清代硕儒

张裕创(字廉卿)的书法诗文,十分崇敬,经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介绍,到中国拜张廉卿为师留学七年,1894年回国。1895年2月,宫岛大八被聘为帝国大学汉文科讲师,教授汉语、汉学,同年5月,创立汉语学校“咏归舍”(1898年改称善邻书院),1897年9月,兼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学科讲师。1901年,宫岛大八辞去东京外国语学校的工作,专门经营善邻书院,直到1943年7月因病去世。

井上翠,1875年生于日本姬路市,5岁丧母,自幼随父学书法,7岁入姬路市小学,14岁入姬路中学,18岁时父病逝,为维持家计未上高中,当了小学代课教员,1895年通过考试获得正式教员资格。1898年,到东京边在小学教书边求学,1900年通过考试获得中学习字课程教员资格,1901年获得汉文教员资格,尔后回到姬路做中学教员。1902年返回东京,在府立一中任教,该年8月,中国清朝官员吴汝纶访日,考察东京府立一中,引起井上翠对中国和汉语的兴趣,从而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别科学习汉语。1906年,井上翠为了积累教中国人日语的经验,以寻机会到中国学习汉语,进入东京宏文学院做日语教员,同时在“赴中国女教员培训所”教汉语。1907年,井上翠到北京京师法学堂任日语教习,工作之余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编纂日汉词典。1911年,井上翠教习任期结束回到日本,1913年到广岛中学教国语和汉文,并在“偕行社”教汉语,1916年转到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教汉语,1922年转到大阪外国语学校教汉语,1936年退休后回到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任教,1942年退休,1946年重返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坛,1949年最后退休,1957年83岁时去世。

秩父固太郎,1876年生于东京,8岁入庆应义塾小学,次年丧母,14岁入中学,19岁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学理科,毕业后在工厂从事机械维修、管理,次年入中等技校夜间部学习。1898年11月,秩父固太郎在亲戚家与中国留学生王鸿年相识,二人互教互学,成为亲密朋友。1904年,王鸿年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秩父固

太郎随王到了中国四川,任彭县中学教习,学会了四川话。1907年,秩父固太郎回到日本,为了扎实掌握北京官话,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学习。1912年毕业后,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满铁”工作,做辽宁熊岳城日本人中国人同校的小学教师,1913年调到大连“满铁教员讲习所”教授汉语、中国情况和日语教学法。1917年,他到北京进修一年,1919年兼大连商业学校夜间部教员,1920年大连外国语学校成立,应邀去兼课。1921年,“满铁”推行汉语水平考试制度,秩父固太郎是命题和阅卷委员。1924年,“满铁教育专门学校”成立,秩父固太郎任主任教授。1926年,日本在大连开播汉语广播讲座,秩父固太郎长期担任主讲人。秩父固太郎在“满铁”从事汉语教学三十多年,直到1945年回国,1948年病逝于长崎县大村。

仔细考察以上七位汉语教师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之所以走上汉语道路,首先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根本的原因,这就是时代的影响。语言是交际工具,不同民族之间,无论是平等交流还是非平等交流,都离不开语言媒介。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否为其他民族所重视、学习、推广,主要取决于其他民族与这个民族需要交流的程度。日本明治以前,中日之间的交流绵延不断,某些时期规模很大,也很频繁,不过,那时的主要媒介是汉字和文物典籍,日本通过中国的典籍吸收中国先进的制度与文化,日本与中国官方交往主要是靠汉文书函,汉语口语的重要性的迫切性尚不突出。

明治维新以后,在欧美殖民主义势力东进亚洲,侵略中国,日本也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日本为了自强,为了与欧美抗衡,并争夺亚洲,采取了加强与中国关系,向中国大陆发展的战略。1871年,日本主动与中国签订“修好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尔后,中日间的文书、人员往来日益增多,急需翻译,于是,日本外务省设立了“汉语学所”。这是明治时期第一个专门的汉语教学机构,也是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开端。当时,日本有些人士从亚洲形势和

明治政府的政治、外交动向,看到了汉语(主要是现代汉语口语)的重要性,于是,开始走上汉语学习和汉语教育道路。这七个人物中,颖川重宽是“中日修好条约”谈判、签署的直接参与者,三次到中国。他由长崎调到东京汉语学所,从旧唐通事走上汉语教学道路,成为明治时代最早的汉语教师,完全是日本的外交需要。广部精学习汉语,创办汉语学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实践从父亲那里承继下来的“亚洲观”,为“日本开国”、“中日亲和”、“挽救亚洲”培养汉语人才。中田敬义是日本外务省第一批从地方选拔到汉语学所学习的学生,也是第一批选派到北京学习北京官话的留学生,回国后一直在外务省工作,同时兼汉语学校的教师。御幡雅文是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选派到北京学习北京官话的,回国后被分配到军队当汉语教官。宫岛大八如果没有中日建交,没有其父与中国公使馆人员的交往,兴许就没有他长达七年的中国留学机会和后来的汉语教育事业。井上翠是受清朝政府高官吴汝纶访日影响,才决定学汉语当汉语教师,并通过在中国当教习掌握汉语,终于走上汉语教学道路的。秩父固太郎也是在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形势下,才有可能结识中国官派留学生王鸿年,并获得到四川当教习的机会,学习掌握汉语,成为一名汉语教师的。总之,他们七个人进入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生涯,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影响,都与当时的中日关系、日本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是时势造就了这样一批日本早期的汉语教育人士。

这七个人物走上汉语学习和汉语教育道路,除时代影响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其他诸种因素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 寻求个人出路和抱负。任何一个人,无论生长在什么国家、什么时代,在步入成年的时候,都面临着个人出路问题。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赴那里谋求发展机会。这七个人中,有的原来就立下志愿学

习汉语,想以此干一番事业。例如广部精、御幡雅文,他们到东京就是要学好汉语,从事汉语方面的工作,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有的人开始时并未重视汉语,后来由于某种契机对汉语发生兴趣,开始学习汉语,决心做汉语教师。如井上翠、秩父固太郎,他们是在就业以后中途转入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师道路的。然而,汉语教学最终都成了他们的职业,而且成了他们的事业。

2. 家庭或老师的影响。这方面比较明显的是颖川重宽、广部精、御幡雅文。颖川重宽出身于唐通事世家,家庭给了他汉语资本。明治维新以后,他被政府起用做译官,从事汉语教育,可以说是梦寐以求,香火继续。广部精的家庭影响主要是来自其父,他接受了父亲的政治主张,认识到日中要“亲和”,“挽回亚洲衰运”,首先要互通语言,日本要有汉语人才。正因如此,他立志学习汉语,办起了汉语学校。御幡雅文所受影响主要是来自汉学塾的老师,老师数次在课堂上赞扬在“中日修好条约”谈判中担当翻译大任的郑永宁,对御幡雅文产生了极大诱惑力。老师还介绍他到东京投拜郑永宁,为后来成为一名汉语教师和翻译启开了大门。

3. 从汉学跨进汉语。日本自古以来上就有崇尚汉学之风,幕府时代和明治时代汉学相当普及。这七位汉语教师,多数人父辈有汉学修养,本人从孩提时代就学习汉字、汉文。日本汉学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教授方法,不管汉语本来的发音,汉字、汉词及其所蕴含的汉文化使这些人萌发了对汉语的兴趣,并打下了一些基础。所以,后来一经获得某种启示或契机,他们马上就跨入了汉语的大门。唐通事出身的颖川重宽自不必说,其他人如广部精、中田敬义、御幡雅文、宫岛大八均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六七岁就在寺子屋、汉学塾学写汉字,读《三字经》、“四书五经”,有的还从私塾先生那里接触过汉语语音。因而,当后来汉语受到政府和社会重视,显示了其新的价值和前途的时候,学习汉语,从事汉语工作,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第一选择。

4. 接受汉语科班训练。不言而喻,做汉语教师须有扎实的汉语功底。1871年中日缔结“修好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马上就筹建了汉语学校,并及时将所教汉语由南京话变成了北京官话。为了教学需要,就连唐通事出身,汉语功底较深的教师颖川重宽,也认真补上了北京官话课。后来的广部精、中田敬义、御幡雅文、宫岛大八、井上翠、秩父固太郎,几乎都是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接受过科班汉语教育。在明治时期,东京外国语学校(今东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是官办的正规的外国语学校,汉语学科师资力量很强。汉语科班出身,为这些人奠定了良好的汉语基础,汉语成了他们的立身之本,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方向,这就是,从事汉语教学或翻译工作,发挥一技之长。

5. 与中国人的交往。事实证明,要很好地掌握一门外语,与目的语国家的人交往十分重要。这七个人物与中国人的相识和交往,是他们汉语水平得以提高的重要条件,甚至是走上汉语道路的诱因。广部精的汉语主要是拜中国人周幼梅、薛乃良为师学习掌握的。宫岛大八最初接触的是中国公使馆人员,黄遵宪的弟弟是他的汉语启蒙老师。秩父固太郎之所以对中国和汉语产生兴趣,自愿到四川当中学教习,后来成了汉语教育专家,主要是因为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王鸿年。其他人虽最初未认识中国人,但是,在汉语学习及工作过程中,都与中国人有一定接触和交往,在接触和交往中增强了对汉语的兴趣,提高了汉语水平,与汉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6. 到过中国的经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挺进中国大陆的战略,加上交通工具比起古代已大为便利,不管是自愿还是被动,是行善还是为恶,日本人到中国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这七个人中,颖川重宽作为谈判译官三次到过中国;广部精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时,先后两次做军需到了辽东半岛;中田敬义在北京留学、工作5年;御幡雅文在北京留学两年,在台湾当翻译3年,在

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三井书院、东亚同文书院任汉语教师6年，共计11年；宫岛大八在中国留学7年；井上翠边当教习边学汉语，在北京呆了4年；秩父固太郎在四川当教习3年多，在“满铁”当汉语教师长达33年。这些人在中国的丰富经历，使他们成了中国通，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和较强的实际运用能力，从事汉语教学如鱼得水。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每个人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七个人各自走上汉语教师道路的过程简化为如下公式：

颍川重宽：唐通事——译官——汉语教师。

广部精：学汉学——跟中国人学汉语——办汉语学校。

中田敬义：学汉学——入汉语学所和东京外国语学校学汉语——到北京留学——做外务省翻译兼汉语教师。

御幡雅文：学汉学——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汉语——到北京留学——做汉语教师及翻译。

宫岛大八：先后在中国公使馆、支那语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学汉语——到中国留学——办汉语学校。

井上翠：小学、中学教师——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汉语——做中国留生日语教师——到北京当日语教习兼学汉语——做汉语教师。

秩父固太郎：结识中国人王鸿年——到四川当中学教习——入东京外国语学校重修汉语——做汉语教师。

从这些公式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七个人走上汉语教师道路的具体过程各自有所不同，但异中有同，大同小异，在明治时期具有代表性。

七位汉语教师的实绩及评价

这七个人在走上汉语教师道路以后，工作实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办或支持汉语学校。明治前期，是日本近代汉语教育的起步阶段，因为以前没有汉语学校，为了发展汉语教育，培养汉语人才，首先需要设立汉语教学机构。这在当时既是政府的要求，也是一些有志之士的愿望。这七个人中，颖川重宽是明治时期第一个汉语教学机构“汉语学所”的筹建者之一。虽然汉语学所属于官办，颖川重宽是从长崎调过去的，但搞汉语教育正是他的志向所在。汉语学所建立后，主要负责人郑永宁主要在外务省，主持汉语学所业务的实际上是颖川重宽。后来，汉语学所并到东京外国语学校，又并到商业学校，但颖川重宽始终是汉语学科的负责人。广部精是明治时期第一个私人汉语学校的创立者，他学习汉语不到两年，就办起了汉语学校“日清社”。“日清社”加之后来的“日清馆”尽管仅存在了5年，但体现了广部精兴办汉语教育的热忱。宫岛大八创办的“善邻书院”（起初叫“咏归舍”），在明治时期的汉语学校中，是最有影响、延续时间最长的私立汉语学校，至今仍存在于东京。之所以如此，主要靠的是宫岛大八的声望和苦心经营。七个人中的另外四人，虽没有创办和参办汉语学校之举，但在支持和推进汉语教育事业方面也做了一些重要事情：中田敬义是日本明治初期向中国选派北京官话留学生的倡导者；秩父固太郎是日本“满铁”汉语教育中的主要角色，长年主持大连汉语广播讲座；御幡雅文、井上翠先后或同时任多所学校执教，竭尽全力支持有关学校的汉语教育。

第二，从事汉语教学，培养汉语人才。明治时期，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增长迅速，教员非常缺乏，这些汉语教师往往受聘于数方，忙得不亦乐乎，但他们乐此不疲。比如广部精、御幡雅文、秩父固太郎，同时任三四处担任汉语课教学，有的还在家里接待学生；颖川重宽在筹备汉语学所时，三个学生寄宿在他家，他白天上班晚上回来教他们汉语。这些教师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在中国的收获、体验，汉语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因而深受学生欢迎。宫